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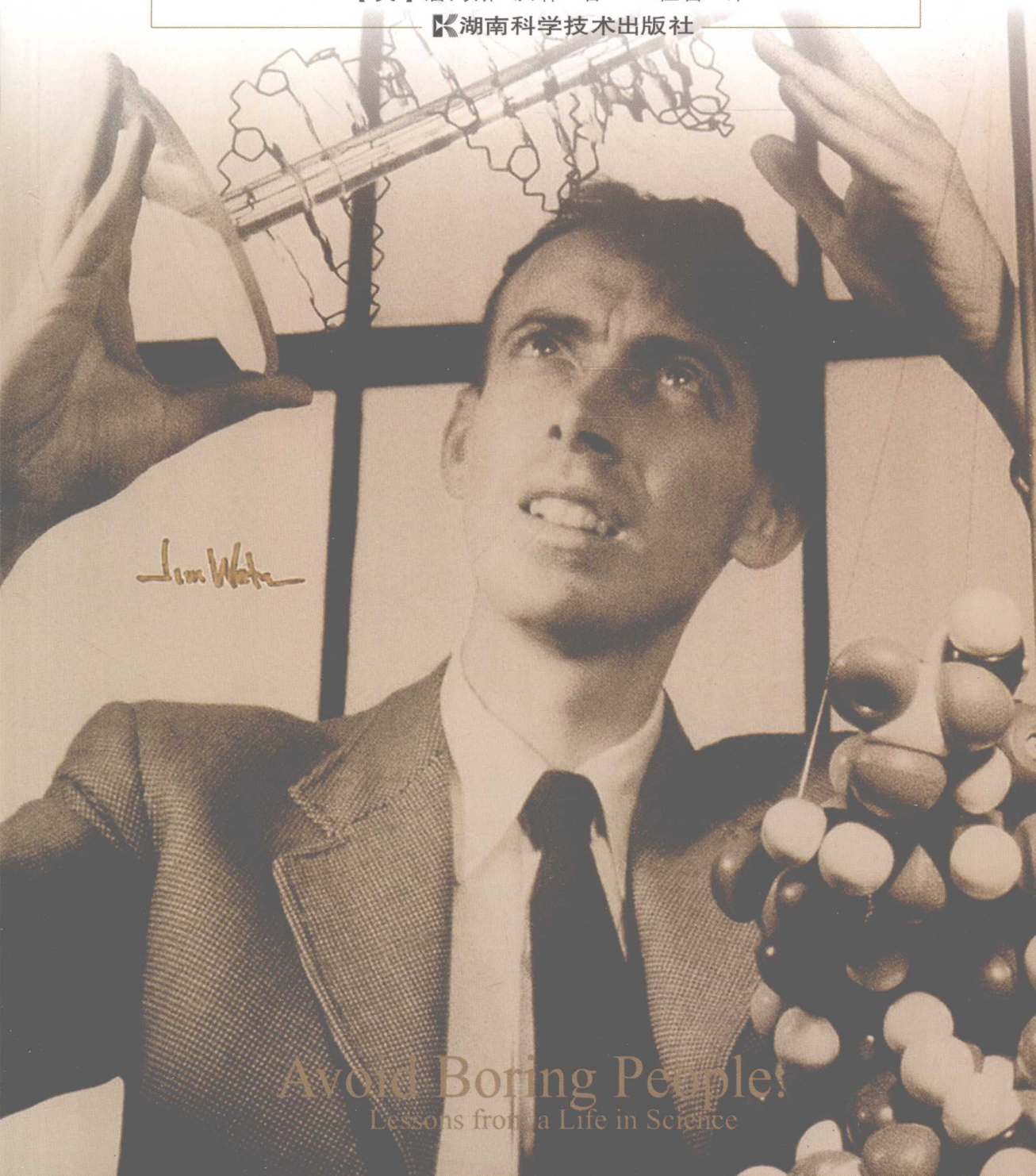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美】詹姆斯·沃森 著 王祖哲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void Boring Peopl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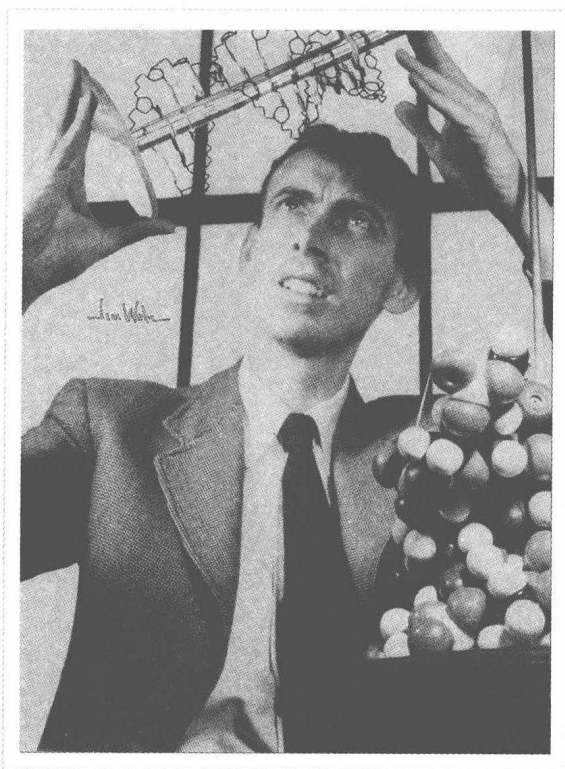


● 科学家传记系列 ●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Avoid Boring Peopl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



【美】詹姆斯·沃森 著 王祖哲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 (美) 沃森著 ; 王祖哲译.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5

(科学家传记系列)

书名原文: Avoid Boring People

ISBN 978-7-5357-6647-2

I. ①不… II. ①沃… ②王… III. ①沃森, J. D. — 自传 IV. ①K837.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9309 号

Avoid Boring People: 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

Copyright © 2007 by James D. Watson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

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8-169

科学家传记系列

不要烦人 科学生涯经验谈

著 者: [美] 詹姆斯·沃森

译 者: 王祖哲

责任编辑: 孙桂均 吴 炜

文字编辑: 陈一心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井湾路 4 号

邮 编: 410004

出版日期: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12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6647-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前 + 言 |

我所写的大多数未曾发表的东西——手稿和书信，备课内容与实验笔记，有我参与写作的大学与政府公文——都存于哈佛大学和冷泉港的档案室里；假以时日，通过互联网，公众可望得而观之，那些对我的生活经历过分好奇的读者都可以看到。与其让其他评论家捷足先登，不如我自己对那些材料善加利用，以准备编成关于我中年之前的生活的这本书，就变得明显了——我的童年、大学生活、作为一名活跃的科学家和教授的职业生涯，以及我作为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最初那些年月。

随着本书广泛的内容趋于紧凑，我开始把该书看做一堂实物教学课，即便不把它当作关于一个科学家成长的一部可资参考的历史。该书是我的一些忠告，采取的形式是把我科学界和学术界航行过程中采取的做派汇集起来。具有指导价值的想法，以自成一格的形式出现，或许就一目了然，于是我就以一组“难忘的教训”为每一章煞尾——那是些行为规则；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些规则决定性地把我儿时的许多梦想变成了现实。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本为那些正在出息的人写的，也是为那些已经爬在顶上的人写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当领导的那些年月，机会多多，却没干正事儿。

在高中跳级，我从来没学得会怎么打字；甚至在今天，我写的全部东西，第一稿全是我的左撇子手写版。我笔走龙蛇，字迹几难辨识；多亏了我的管理助手莫林·贝瑞雅克，解读技术日渐精进，否则此书难以问世。在最早准备这部手稿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伯纳德学院能干的研究生柯林·赫斯林格的帮助；她英语绝佳，对我的措辞做了许多润色。纽约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玛丽萨·马卡里，帮助我巧妙地把照片和文件插在文本当中。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主修生物学的阿格尼斯泽卡·米尔克扎瑞克，帮助我纠正了一些事实和拼写上的错误；我把草稿发给了一些朋友，他们指出了一些错误。最后，我非常感谢诺普夫出版社的乔治·安德瑞欧的精细编辑，这大大提高了本书的清晰性与学术上的影响力。

詹姆斯·沃森

2007年3月26日

| 序 + 言 |

芝加哥大学的老校长罗伯特·梅纳尔·哈钦斯，曾经说了句俏皮话，他说，每当有了锻炼身体的冲动，他就立刻躺倒。这是夸张了（和詹姆斯·沃森一样，他也热衷于网球）；他的意思是他更看重另一种严酷形式的运动，即心智的运动。在这一方面，詹姆斯·沃森是哈钦斯一位真正的同道，正如他的书和生活所生动展现的那样。

在哈钦斯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不仅在沃森的求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他对教育的不断思考中的一个基准点。如果通识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学生终生不懈地思考如下问题，那么沃森就是这种教育成功的光辉范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涉及什么东西？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品质？为什么是这样？在我们最近的记忆中，哈钦斯把他的大学搞成了关于课程设置的学术目的这样的问题的最激烈的争论的发生中心。哈钦斯和沃森一样，永不自满。他的大学，他说，或许不十分好，但它曾经是最好的大学。对大学生而言，“最好的大学”必须有一种关于全面教育的眼光，那就是要引导学生倾心于人类生活与文明的那些最深刻的问题，倾心于曾经面对过这些问题并试图理解这些问题的伟大的著作家和思想家——这样一种教育，是要教导学生以严格性与正直心来思考，并且在他们可能遭遇到的任何环境下，都一如既往地如此思考。

这位初出茅庐的鸟类学家，进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院，离开的时候却是一个准备向基因研究冲刺的人；他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一个雄心勃勃的专业，而这个专业却总是需要保持尽可能广的学术好奇心。詹姆斯·沃森领悟到，要胸怀一项使命，那就是要追问最难的问题，或许是难以驾驭的问题，并且戒惕而多虑地思考之，诚实无欺地表达自己的观念，无论这种思考和表达会导致什么后果，全然不考虑如今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不考虑其他种类的协调一致，不考虑私心杂念，甚至不考虑礼貌。

幸运的是，这么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并不排斥欣赏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上的快乐与缺点所需要的那种精细的感觉。沃森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僧侣一般苛刻的年轻大学生，一个满怀热情、大器晚成的社交好手。他用来观察人与事、成就与愚蠢（包括他自己的愚蠢）的那种新鲜眼光和坦白直率，或许只能来自他在每一生活际遇中发现的那种新颖性；这种新颖性使生活永远都趣味盎然。

这些品质汇聚一处，在《双螺旋》中，一如在本书中，都自始至终放射着光辉。为《双螺旋》手稿的出版，詹姆斯原封不动地讲述了这场斗争的前前后后，这几乎和那本书本身一样引人深思。《双螺旋》成了一部经典之作，告诉我们科学实际上是怎样搞的；与之相似，目前本书描述的，是在一个更广大的科学世界和研究世界中，一位独特人物的职业生涯轨迹。此书将与《双螺旋》一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詹姆斯·

沃森的革命性成就。

詹姆斯·沃森这个人物与众不同的方方面面，在详列于每一章尾部的“难忘的教训”中也跃然纸上。有一些教训或许比其他的更有教益。“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之后，你得准备着增加体重”，嗨，这和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关系；“星期天也工作”倒更可以仿效。“不支持指望奇迹发生的研究计划”，这种智慧，也是有用的。

“不要用自传为过去的行动或动机提供理由”，这条格言相当精妙地显示了这本自传的迷人色调，及其直言不讳的自我揭示。与此同时，“不要烦人”这条劝诫，大可不必，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詹姆斯·沃森做不到的话，那么他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让人觉得乏味。

因此，我们大家都得感谢詹姆斯，因为他的书非同凡响，实践了自己的忠告：“把好故事首先讲出来。”

汉娜·H. 格雷
芝加哥大学

| 目 录 |

前言	(iii)
序言	(v)
1. 儿童时代	(1)
2. 上大学	(13)
3. 在研究生院	(24)
4. 噬菌体小组	(35)
5. 胸怀大志的年轻科学家	(46)
6. 重要的科学需要的做派	(61)
7. 非终身教授	(77)
8. 准备发起学术进攻	(89)
9. 可有可无的白宫顾问	(102)
10. 获得诺贝尔奖	(113)
11. 不称职的学者	(128)
12. 可读之书背后	(140)
13. 学术礼貌	(158)
14. 一身两役	(171)
15. 依依不舍告别哈佛	(189)
尾声	(209)
人物表	(216)
难忘的教训	(225)

1. 儿童时代

1928年，我生在芝加哥的一户人家，这家人相信书本、鸟和民主党。我是头一胎，两年之后，我妹妹贝蒂接踵而至。我在圣路加医院出生，从海德公园开车去这医院不远。我父母在1925年结婚之后，就住在海德公园。贝蒂降生之后不久，我父母搬到了南岸区，邻居是中产阶级，住的是独门独户的平房和两层小楼，空地不少。我们住在墨溪大道的一所公寓里，1933年之后又搬到了我父母买的一座四室的小平房里，它在两个街区之外的露伊拉大道7922号。我72岁的姥姥不阔，搬到那儿，可以和我们住一块儿。她住后面那间卧室，靠着厨房。在新隔出来的小小阁楼房间里，我和贝蒂睡在火车铺位似的小床上。

尽管我上了芝加哥大学实验附小的托儿所，但是大萧条使我父母很快就承担不起私立教育。然而，转到了公立学校，我不觉得低人一等。我们露伊拉大道的家，离贺拉斯·曼文法学校只有5个街区；这个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从5岁到13岁，我在那儿上学。20世纪20年代早期，它还是一座比较新的砖楼，都铎风格；有个大礼堂适合开会，还有个健身房，我在那里只能做两三次俯卧撑。

我父亲的父母，都信美国新教圣公会。我爷爷托马斯·塔尔曼·沃森，干股票经纪人，全家只有他是共和党人。我奶奶，总为做了一个投机商的老婆而闹心，十年如一日地为民主党投票，以此表示不满。她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内尔·德威·福特。奶奶的母亲是于1633年来到波士顿的殖民者托马斯·德威的后裔。我们家姓沃森的，



1929年和我母亲在一起。

可以追溯到出生于新泽西的威廉·韦尔登·沃森（1794年生），这人做了浸信会的牧师。浸信会是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阿巴拉契亚山西边头一次建立的。他坐着大篷车（还没铁路呢）从费城的一个浸信会开会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台汽水机，这东西在田纳西州是头一次露面。为了对付喝威士忌的魔鬼们，他把汽水机装在教堂附近的街角，单枪匹马、不亦乐乎地制造汽水。传说他卖汽水赚了好多钱，就为他蓬勃壮大的信众盖了一座新教堂。这教堂至今仍然矗立在纳什维尔的中心地带。



我父亲老詹姆斯·D. 沃森在1925年，那年他和我母亲成婚



我母亲玛格丽特·吉恩·米切尔·沃森，穿着苏格兰方格子裙子装模作样

他的长子威廉·韦尔登·沃森二世，搬家到北边的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据说在那里他为亚伯拉罕·林肯设计了一座房子，和他自己的房子隔街相望。后来，他和他妻子以及兄弟本，陪着林肯坐火车到华盛顿就任总统。本的儿子，威廉·韦尔登·沃森三世（1847年生），在1871年和奥古斯塔·克罗夫特·塔尔曼成婚，她是伊利诺伊州的圣查尔斯这地方的一位信圣公会的银行家的女儿。后来他开了一家旅馆，先是在芝加哥北部，后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日内瓦湖。在那里他养了5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我爷爷托马斯·塔尔曼·沃森。我爷爷在1895年结婚之后，起先是在新发现的莫沙比山碰运气。莫沙比山脉富有铁矿，靠近西边的苏必利尔湖上的德卢斯市。然后，他投奔了他哥威廉，威廉后来成了莫沙比山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我父亲老詹姆斯·沃森，生于1897年，此后10年，他的3个弟弟威廉·韦尔登四世、托马斯·塔尔曼二世和斯坦利·福特相继降生。

从明尼苏达北边，我爷爷奶奶搬回到芝加哥地区，多亏奶奶的钱，我爷爷就买了

一座殖民复兴式的大房子，位于芝加哥西边的福善之地农庄区。我父亲上了当地的学校，此后在俄亥俄的奥伯林学院上了一年学。爸爸上大学上了一年级就作罢了，他得了猩红热，没得学位。第二年他改弦更张，进了芝加哥商业银行中心（就是卢普那个地方，卢普是“圆环”的意思，高架铁路在那里画了一个大圆圈），在哈里斯信托公司工作。缺钱，通常是这样。

但是，赚钱从来也不是我父亲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伊利诺伊州的“国民自卫队”（第33师），很快就被船运到了法国，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一回家，他就开始在“拉萨尔继续大学”工作，这是个挺兴盛的函授学校，那儿有商业方面的课。1920年，他在那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我母亲玛格丽特·吉恩·米切尔（1899年生）。她在芝加哥大学上了两年学之后，就到这个学校的人事部门工作。我母亲是劳彻林·亚历山大·米切尔和伊丽莎白·格利森的独生女。外祖父劳彻林是一个在苏格兰出生的裁缝。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一对移民夫妇（迈克尔·格利森和玛丽·柯廷）的女儿。这对夫妇是在1840年代后期的土豆饥荒时从蒂珀雷里郡移民来的。在俄亥俄务农10年，他们搬到了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市南边的土地上。正是在那里，在1860年，我的外祖母，即我和贝蒂的姥姥，出生了。

早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姥姥就离开了格利森农场，做了巴克府里的一名佣人。在芝加哥市，巴克府是最殷实的一家人的宅子，他们有个工厂，制造火车车厢。姥姥很快就被提拔为巴克太太的贴身丫鬟，陪着她到中西部的矿泉疗养地去逍遥。后来，巴克先生发了善心，把她安置在芝加哥的一套公寓房里，给了钱，允许她自己过日子。十来年之后，那时她三十五六岁，和劳彻林·亚历山大·米切尔结了婚。劳彻林于1855年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父亲是罗伯特·米切尔，母亲是芙罗拉·麦金南。

年轻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劳彻林·米切尔移民到了多伦多，又转到了芝加哥。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他定做服装的生意火了。悲惨的是，他死于事故：被一辆马车轧死了。在除夕夜，这辆马车从“朝圣者之家”旅馆里出来，马受惊了。其时我妈妈才14岁。我妈妈只记得他从苏格兰给她寄了一条麦金南牌的苏格兰方格呢短裙，还记得属于他的一幅棒极了的蜡笔画，是在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据说这是他用一套定做的服装换来的。姥姥开始招待顾客，其时在芝加哥的南岸地区开了一家爱尔兰式的寄宿公寓。

在身为少女时，我妈妈长期受风湿热之苦，她心脏受损；稍一运动，就呼吸急促。这病最终折了她的寿，57岁死于心脏病。和我姥姥一样，我母亲信天主教，但从来不循规蹈矩地上教堂。我记得她仅仅在圣诞夜和复活节才去参加弥撒，总说她的心脏需要在周末休息。有许多日子，特别是礼拜日，姥姥帮着做饭。在芝加哥的爱尔兰人中，厨艺像她那么好的人不多见。她很早就住在我们家，妈妈才能在芝加哥大学的房管办公室工作，算是帮衬一下我父亲并不丰厚的薪水。大萧条把他的年薪削去了一半，剩下3000美元。

我们房后有一条小路，把露伊拉大道西边的这些房子，和帕克斯顿大道东边的那些房子分开了。路上通常少有车辆，在这地方玩踢罐子的游戏或者放鞭炮，就安全

了。当时在国庆节还可以随便买到鞭炮。等我最终长过了5英尺的时候，车库门顶上就安了一个篮球的篮板，好让我在放学后练习自由投篮。虽然家用不足，我们也买得起一个乒乓球桌，好在冬天活动活动。

我那位不信教的父亲，勉强同意为我妹妹和我做了天主教的洗礼。他这是为了和我姥姥保持和平。当我妹妹和我在礼拜日跟姥姥一起上教堂的时候，他或许就为自己的妥协追悔莫及了。背诵教义问答手册，向牧师忏悔我那些可饶恕的罪，起先我是不把这当个事儿的。可到了10岁，我明白了西班牙内战，我父亲让我知道天主教会站在了他嗤之以鼻的法西斯的一边。尽管“我们和平的圣母玛利亚”教堂的一位牧师布道支持“新政”。可是信众里有许多人买来了考哥林神父硫酸似的杂志，来反对罗斯福、英格兰和犹太人。每次礼拜日的弥撒，都有人在“我们和平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外面买这种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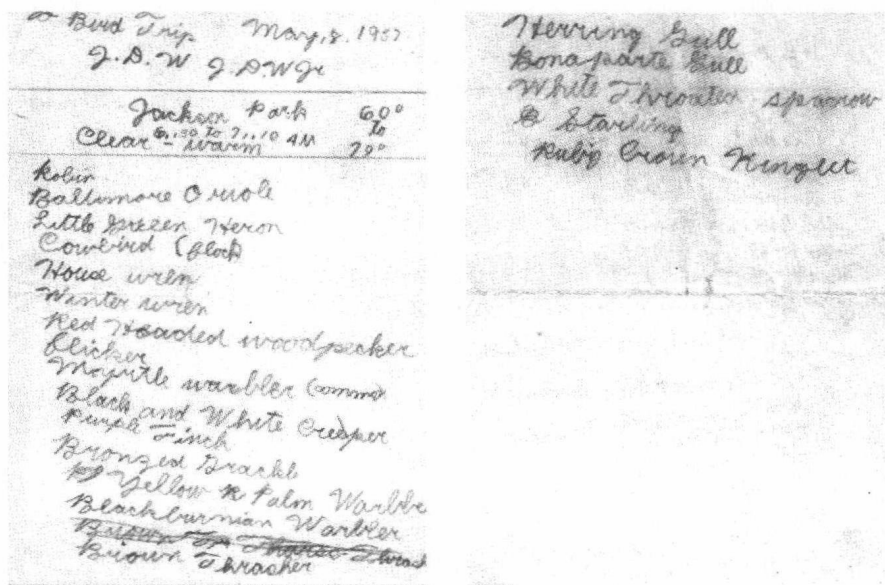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米切尔于1925年在芝加哥市，那时她还没有做我的姥姥。



贺拉斯·曼文法学校幼儿园班的照片，1933年10月。我坐在地板上，左起第二个，戴着个蝴蝶结，沾沾自喜。

11岁那年刚做完坚信礼，我就完全停止参加礼拜日弥撒，这样才好在星期天早晨跟我父亲出去看鸟。尽管我年幼，可是着迷于鸟。我才7岁，我叔叔汤姆和婶婶埃特就给了我一本关于鸟类迁徙的儿童书《与鸟同行》，儒迪厄德·保尔顿写的，他是

“芝加哥自然志田野博物馆”的馆长。我父亲热衷于观察鸟，这要追溯到他在农庄区上高中的年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家搬到了芝加哥南区海德公园的一个公寓房里，好让他哥比到芝加哥大学上学方便，他这种兴趣一如既往地强烈。春秋时节，爸爸在大多数日子都在日出之前起床，到附近的杰克逊公园去看鸟。在那儿，我头一次学会辨认几种无迁徙习性的常见鸭类，包括鹊鸭、长尾鸭、巨头鹊鸭，以及美洲秋沙鸭。我在春天很快就学会了分辨最常见的莺、绿鹃、鹪，它们在春季从过冬的热带家园往北迁徙。11岁的时候，关于鸟，我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书本知识。1939年我们借了一辆车去看旧金山世界博览会，在路上遇见的许多新种类，我提前就知道了。那一趟旅行，我为已经熟悉的鸟类增加了50多个新种类。



很早我就跟我父亲学着仔细写观察鸟的笔记。

我妈妈，当时是第七选区的区长，乐于为民主党工作。我们的地下室成了当地的投票站，每次选举，能为我们赚10美元，我妈妈为投票工作又赚10美元。1940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我们徒劳无益地支持保罗·麦克纳特，印第安纳州的那位潇洒的州长，当时指望他当罗斯福的竞选伙伴。

晚上，父亲常常把工作从办公室带到家里来做。作为拉萨尔函授学校的学费经理，他的主要任务是写信给拖欠学费的学生，催他们交钱。他从来不相信威胁他们会管用，却甜言蜜语地提醒他们，法律和会计学习会如何帮助他们找到挣钱多的工作。我现在才明白，要保住这份工作有多么难；他是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对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满怀同情。然而，没有人指责他工作不努力、破坏自由企业，也没有人指责他不赞成阔佬玩的高尔夫球。他年轻时就喜欢高尔夫球，在大萧条迫使哈得逊家族变卖了产业之后，他只能在公司组织的外出活动中玩这种游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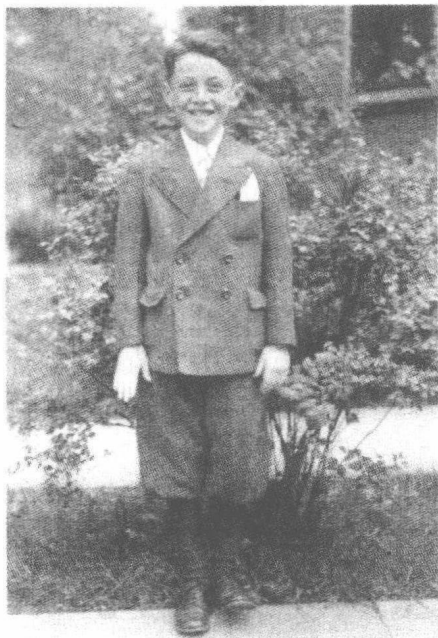
我们家一贯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这一政策允诺把社会从没心没肺的

资本主义掌握的低迷状态中解救出来。密歇根湖西岸，从我们家往西两英里，是美国钢铁公司在南区的大型钢铁厂。当罢工工人以武力和公司抗衡的时候，我们自然站在罢工者一边。然而，在德国人的威胁加剧的时候，经济问题对我们家的影响却小了。我父亲坚决支持英国和法国，那是他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国。即便没有希特勒，他也会发现德国人是他的天敌。

当马德里被佛朗哥占领的时候，我记得他的愤怒。当地的广播电台吵闹着要挫败把共产主义当靠山的共和党人，但父亲当时把法西斯和纳粹看做真正的恶魔。到慕尼黑会议的时候，收音机里的欧洲新闻，和《孤胆骑警》、芝加哥幼兽棒球队的消息一样多。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是194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罗斯福想竞选第三任，却遭到了温德尔·威尔基的反对。对欧洲的麻烦，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想作壁上观，他们看来几乎和纳粹一样坏。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访问德国，我父亲和一些人把这个看做一种反犹太姿态。

我父母手头拮据，时不时地为怎么叫乱花钱而唧唧歪歪。但这种窘境没传到我妹妹和我这儿来：我们总能得到5美分，星期六下午去附近的天堂岛剧场看连放两部的电影。我父母有时和我们一块儿看电影，有一次演的是约翰·福特根据斯坦贝克的史诗般的小说《愤怒的葡萄》改编的电影。伟大的道德准则本身导致不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这个教训总是萦绕在我心头。旷日持久的干旱，把一片肥沃的农场变成烟尘缭绕的赤地，不应该使一个家庭失去一切。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看了这部片子，怎么却看不到新政带来的好处，此事叫我难以想象。

我很喜欢文法学校，有两次跳了半年级，等我毕业的时候才13岁。令人沮丧的是我的两次智力测试结果，那是我从老师的案头上偷看到的。我没有一次超过120分。我从阅读理解课的分数中得到了鼓励，这门课我是全班第一。1941年6月我从文法学校毕业，其时德国刚刚入侵了俄国。到那时候，丘吉尔和我的英雄罗斯福联手来。晚上我们多半是听广播记者爱德华·默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上从伦敦发回消息。那个夏天，我头一次离家，在8月份，坐火车坐了两个星期，到了奥瓦西帕童子军营地，这地方在密歇根州白河附近北边的马斯基根。在那儿，为了得到自然美德徽章，我乐意工作，结果我成了“生命童子军队员”。不怎么好玩的，是整夜拉练，我总是落在其他人的后头，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才赶得上来。然而，等回家



满了10岁后，我就不去参加礼拜日的弥撒了，因为我要去看鸟。

的时候，我很满意，我看到了37种不同种类的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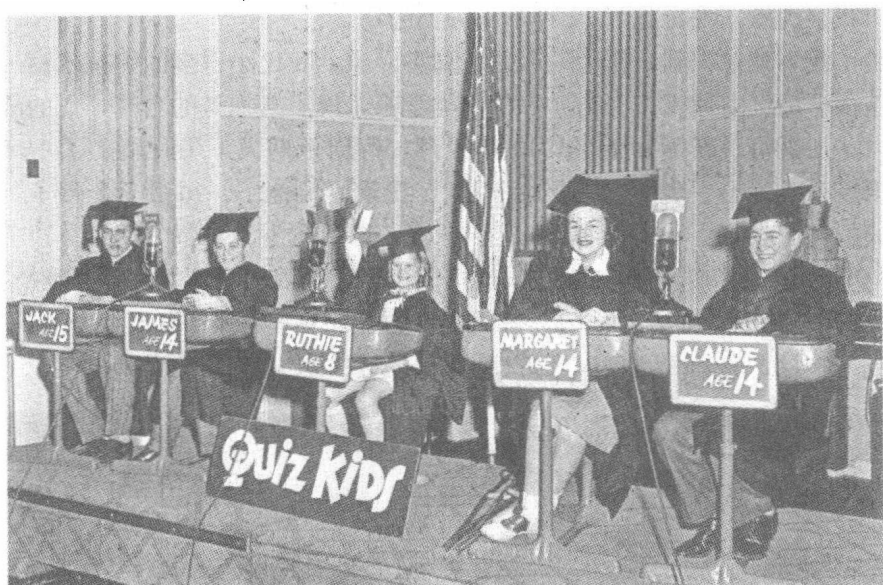
可是，我不禁意识到，作为一名儿童鸟类专家，我比小得多的杰拉尔德·达罗差得远。这孩子记忆力惊人，身为4岁的鸟类学家，成了芝加哥的名流，他的故事和天才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1940年6月，每周星期日下午，新上了一个广播节目，他第一个成为出了名的“答题小孩儿”，我就更恨他了。每组5个孩子，每人得到100块的保底券，主持人提问题。主持人是三年级的乔里·周·凯莱。以前他当过“全国谷仓舞”的主持人，头一次在收音机上出名，是因为在调幅广播上读滑稽故事。“答题小孩儿”几乎立刻轰动全国，每周听众数在1000万到2000万人，几乎是收听笑星杰克·本尼、鲍勃·霍普以及雷德·斯科尔顿的庞大听众的一半。



罗素·哈特和我于1941年在到男童子军营地的路上。

实际上，有两年多的时间，我每个星期日下午都听“答题小孩儿”，希望我也有办法上这个节目，也赢得一张战争债券。我之所以有这个奢望，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这节目的制作人之一爱德·西蒙斯，就住在和我们的平房相邻的公寓房里。最后，可能是因为我面试合格，也可能是因为爱德·西蒙斯能说了算，我就成了1942年秋14岁的“答题小孩儿”。我头两次的露脸很顺利，许多问题都是我拿手的。但是，从第三次开始，我的对手是一个18岁的鲁思·达斯金，连珠炮似的问题都和《圣经》跟莎士比亚有关，占据了这恐怖的30分钟。从来没人让我了解莎士比亚剧本的情节，我早些年的那种天主教的教养，让我保证不知道《旧约》的事儿。因此，其实是命中注定了，下次再来参加节目的3个选手当中，必定没有我的份儿。回到家，我满怀苦绪地希望得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还得需要一个“答题小孩儿”必备的机灵劲儿。但是，我却多得了3张债券。后来，这三张债券用来买了一个宝石蓝公司7×50双筒望远镜，代替了我父亲从小用来看鸟的那一个旧的。

到我在新建的南岸高中上高二的时候，我大体仍然是一个优等生，尽管我遇到的



当了1942年的一个“答题小儿”，左起第二，我不熟悉《圣经》和莎士比亚，我是输定了。

竞争比在比贺拉斯·曼文法学校的时候更大。有一位很棒的拉丁语老师金尼小姐，她派我和更棒的学生玛丽莲·韦恩特劳伯，去州里参加拉丁语考试。我对玛丽莲有点着迷，这事儿没人知道。那时候，我太在乎自己的个头，上高中的时候我才5英尺，比我妹妹还矮。她青春期早，最终长到5.3英尺，而我才5.1英尺。

我断断续续地在街坊的药店里用汽水机造可口可乐，用糖浆和苏打水。还有另一种小孩儿的传统工作，那就是骑着自行车送报纸。那样我跟我父亲清晨出去看鸟的事儿就不成了，因此我也没往心里去。特别是在5月份，我们习惯于天不亮就起来，那样太阳刚一出来，我们就到了杰克逊公园。这样一来，我们就几乎有两个钟头跟踪稀有的莺类，那种鸟主要是在林岛。爸爸对鸟鸣的听觉比我好得多——在听到，比方说，猩红比蓝雀粗糙的叫声的时候，他从来不曾把它错听成歌声婉转的巴尔的摩金莺，这种鸟也是在新叶才发之后迁徙到芝加哥的。看完鸟，爸爸跳上一辆北行的电车去工作，我坐另一种电车背道而驰，在学校附近下车。

正是在杰克逊公园，爸爸在1919年遇上了16岁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内森·利奥波德，这人极其聪明，却拙于交往，也耽于寻找稀有鸟类。1923年6月，利奥波德那位有钱的父亲出资赞助了一次鸟类考察，内森和我爸爸这才有可能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北边的那片长着短叶松的野地里，去寻找柯克兰莺。在追踪这种最稀奇的莺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鸟类学家乔治·波特·路易斯和西德尼·斯坦因还陪着他们。利奥波德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理查德·勒布也去了。西尔斯-罗巴克零售店帝国，就是勒布家帮助发展起来的。

我一上高中，爸爸妈妈就第一次告诉我内森的事儿，他和理查德·勒布是怎么令人发指地残杀了他们认识的一个比他们小的孩子博比·弗兰克斯。他们让放学的博比

40° January 13, 1941 9:00 AM
TC
11:30 AM

The day was very clear and the sun was shining brightly. At 12:00 I went out and heard my first bird for the day. It was the Starling. We were near the park. I saw an Ring-bill Gull. I saw my first snake of the year in the outer harbor. They were the Golden-Eye and the American Merganser. When we arrived on the beach we saw, Robin Eggs, Merganser and Gulls all over the lake. Dad and I then went up on the old pier where he saw a black looking duck. I then cautiously went out to the duck. Then dad followed.

(over)

It was a White-winged Grebe
a new life for both dad and me. The bird was hurt, but we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When there we went to the Bird Sanctuary and there we saw the regular birds. A flock of geese and two swans were seen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From there we took the Street Car home.

在密歇根湖的杰克逊公园，爸爸和我看到了少见的白翅海番鸭。

坐他们的车，却在他头上来了致命的一击，然后把尸体丢在搜鸟蛋人森林附近的涵洞里。后来，爸爸常常带我到搜鸟蛋人森林那里看鸟。在内森于1924年5月24日犯了这件愚蠢却几乎难以破案的罪行之前大约6个月，他父亲接触过我父亲，说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对勒布过于着迷。犯罪的时候，内森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爸爸并不熟悉利奥波德和勒布交往的那些富裕家庭的大学生。7月，利奥波德和勒布在芝加哥的一家法院里当了被告，新闻记者挤了一屋子，辩护律师是大名鼎鼎的克拉伦斯·达罗。达罗要我爸爸当证人。但是，爸爸的家人劝他作罢，说他会因此在芝加哥背一辈子污点。

达罗保住了他的当事人的脑袋之后——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没有假释的可能——内森给我爸爸写了封信，建议保持通信。但是，爸爸从来没有回信，仍然为芝加哥这桩史无前例的罪行发懵。许多叫利奥波德和勒布的人，都改了名字。我爸爸和西德尼·斯坦因中止了全部联系。许多年后，我偶然遇到了斯坦因，其时我们都在芝加哥北岸区沃基根附近的沙丘寻找五月莺和鹌鹑。当时斯坦因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后来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受信托人。当我说自己是吉姆·沃森的儿子的时候，斯坦因非常尴尬。

芝加哥大学总是我们家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因为我父亲认识这大学的校长罗伯特·哈钦斯。我父亲在奥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哈钦斯的父亲曾经是那里的一位神学教授。哈钦斯最近执行了一项令人振奋的计划，只读了两年高中、脑子还没被陈腐的高中生活磨损掉的学生，允许入学。我母亲带了头，看出我应该参加奖学金考试，考试安排在194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不久之后，我被召回大学校园接受个人面试，我

谈的是我最近读过的书，集中谈意大利作家卡罗·莱维的长篇小说《基督驻足埃博利》。此后我就焦躁不安地等待。招生主任是我妈妈的朋友，让她放心，我胜券在握，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等我正式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心花怒放，没有考虑到这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在招生委员会那里人缘好。进入一个我可以好好使用我的大脑的世界——不靠个人名声，不靠身高体壮——这对我是很重要的。

难忘的教训

1. 避免跟大孩子或狗打架

小时候，在班里的男孩子中，我微不足道。唯一的安慰是父母的理解——他们一直鼓励我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巧克力牛奶，这是为了把我养肥。这种混合饮料叫我开心；但是，在上文法学校的时候，别的孩子仍然把我推来搡去的。起先，我的反应是动拳头；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被人叫做胆小鬼，这命运要比挨一顿狠揍好些。躲到街对面，要比和那些吊儿郎当、满肚子坏水的街痞子来个狭路相逢容易些。如此相似，我也不是汪汪叫的恶狗的对手；特别是在我翻过篱笆，进入了它们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那更得对它们敬而远之。为了看到一只稀奇的鸟，不值得被恶狗咬一口。既然被一条德国牧羊犬咬过一遭，我明白了还是跟猫玩儿好，尽管猫是鸟的杀手。与看到一只稀奇鸟这种机会相比，生活要长远得多。

2. 让球旋得厉害些

我一直希望和别人一块儿玩垒球，在七十九大街对面的宽阔的球场上玩。起先我置身其中的唯一办法，是捡界外球。后来，我学会了以下手抛旋球，即便比较好的击球手，也不能按照老套路来打我从外场的防守漏洞里抛出的平直球。从那以后，在星期六上午，我不再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了。这种旋球类似于发乒乓球。在我的胳膊长得够得着我家的乒乓球台的网之前，我已经成了一名不错的垒球员。

3. 不听忽悠，不玩命

看到我的同学横冲马路，为了打一下飞奔而来的汽车，这种英雄壮举，没让我觉得嫉妒，倒叫我惊骇。当我骑车3英里到“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时候，我知道总为我担心的妈妈宁肯我坐电车去。但是，我小心就是——尽可能走小巷子，汽车从旁闪过的时候我从来不撒把——我其实从来也没真的拿命来冒很大的风险。同样，在爬邻居家的树的时候，或者爬到我家一层高的车库的檐槽上的时候，我或许是在冒险摔断一条腿，但掉下来也不要命的。从超过10英尺高的地方跳下来，这种刺激从来也是